

問責制突顯公務員體系重要

前民政事務局局長、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 藍鴻震 (25-07-2003)

兩位主要官員先後辭職，在社會引起一陣震盪，部分人擔心香港政府管治，以至經濟和民生都會受到長遠影響。

但事實證明，證券市場及財經界對今次事件都沒有太大反應。即使穆迪投資懷疑香港的管治模式會否改變，影響投資者信心，甚至懷疑政府改變聯匯的壓力會增加，但其他評級機構，包括標普和惠譽等，均表示不會降低香港評級。而香港各外國商會，包括美國商會也認為事件沒有長遠不利的影響。

其實，只要參考其他先進國家部長下台的經驗，便會明白今次事件並不會對整個問責制，以至政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
筆者曾獲港府派駐日本工作六年，在當地，部長下台雖說不上是平常事，而且多少總帶著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，但也不算上有什麼大不了。

反而在問責制之下，高官的請辭更突顯出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的重要性，以及公務員為香港所帶來的穩定。筆者駐日本期間，便親眼目睹該國由首相以至所有部長的整個內閣多次轉換，對整個日本的經濟、民生帶來的衝激，並非如外人想像中那麼嚴重，原因是當地擁有一個健全的公務員體系，令政府的日常運作和政策推行得以如常進行，不受部長人事變動影響。

由此可見，香港這個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，雖有必要與時逐步改進，但這個由香港多年來建立的寶貴資產，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。政府推行改革時，必須保存公務員體系優點，以確保政府以至整體社會的穩定。

當然，兩位高官離去，實屬不幸。尤其是從事公務員多年的葉太，她一直盡心盡力在政府工作，表現突出，但基於種種原因，最終仍決定請辭，實在令人惋惜。然而，在問責制推行了整整一年的今天，我們不能再以過去(司局長級全為公務員的時代)的眼光來衡量現在的情況，現在兩位高官因應事態發展而離開政府，即使是以私人理由請辭，也體現了問責制的精神所在。

(本文已刊於 2003 年 7 月 25 日之明報)